



■土地与生长

## 想象与期望：我与中国

□(加)达科·苏恩文

达科·苏恩文(Darko Suvín)是当代世界著名科幻文学研究专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之一。悠久的中国文化和文学传统对苏恩文的科幻小说研究及学术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苏恩文对中国文化传统十分景仰,特意要求用“达科·苏恩文”而不是“达科·苏文”作为自己的中文名字。遗憾的是,作为一位“迷恋”中国文化的学者,他的作品一直没能被翻译成中文,直到最近“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的出版,苏恩文的两部在科幻文学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科幻小说变形记》与《科幻小说面面观》才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为此,苏恩文特地撰写“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以表达梦想实现的喜悦和对中国文化的崇敬。

——编者

也许我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告诉我的中国读者,无论是她还是他,他们伟大的国家如何呈现在我的想象当中。

还在孩提时代,我读了一本连环漫画(可能是从美国翻译过来的),里面有个中国清朝官员,双手交叉拢在宽大的衣袖里,在每个场合都要引用孔子的话语。这本连环画讲述的是在中国东海和南海一带活动的海盗,正如我在11岁到13岁之间读过的卡尔·梅和儒勒·凡尔纳的旅行和冒险故事中叙述的那些故事。而且我对于地理和地图总是怀有极大的兴趣,这也是每一部科幻小说智慧的开端。随着1941年春天纳粹德国对南斯拉夫入侵,战争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全家逃亡到了意大利人占领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因为在那里才能得到更多生存的机会。我开始执著地关注前线的动态,随着1943年的临近,战况变得令人欣喜。没有任何人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败产生丝毫怀疑,问题在于谁能够幸存下来看到这一时刻的来临。我和我的母亲最终见到了这一刻,因为我们被铁托的游击队(我的父亲当时就作为医生参加了铁托的游击队)转移到了被解放的意大利南部地区。

所以我不仅关注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且关注着从1946年到1949年间,毛泽东的军队如何势如破竹,席卷全国。接着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作为一个划时代的解放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让欧洲的绝大多数民众感受到“东方变红了”。我那时候已经读了赛珍珠有关中国的作品,我还记得大约在1947年到1948年间,我在高中的文学班级上写了一篇针对《大地》的尖锐评论,认为它反映了中产阶级的混乱迷惑,或者用词可能更缓和一些,但意思大致如此。

在铁托与苏联人的决裂在1955年得到勉强修复之后,我当即通过萨格勒布的一家图书馆订阅了《中国文学》杂志,我记得这是一份月刊。刊登有很好的译文和文章,我现在应该还保留着这份刊物10年左右的集子,就放在阁楼的什么地方。那时我正致力于诗歌写作,被杜甫和白居易深深地迷住了,我当即把前者的一首诗翻译成了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我还通过所有我能够阅读的语言(从俄语到英语)进行阅读,

并尽可能地搜集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始的,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文学作品。而且我通过所有这类报纸和书籍,当然主要还是英语的(诸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取得的经济和政治的成功感到欢欣,尤其为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明智外交政策以及后来在越南解放战争中采取的政策而感到欢欣。我的政治同情一直持续到“文革”的到来,而且持续到“文革”的初始阶段。然后我记得当我读到一个报道,说音乐家们由于演奏莫扎特的音乐,被送去接受所谓的“红卫兵”的“再教育”,我感到再也无法赞同它的做法了……对于1945年以后的欧洲的青年知识分子而言,我的转变是非常典型的,只不过我可能比任何人都对中国更感兴趣。

后来我从南斯拉夫移居北美,在那里不仅讲授戏剧文学和戏剧艺术,而且还在最初的一批大学共同课程中开设了一门关于科幻小说的课程(包括乌托邦小说)。我繁忙的生活只允许我从遥远的地方关注中国的社会政治进程,但我仍然阅读了大量经过翻译的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作品,包括毛泽东的诗作。我发现毛泽东的诗歌在某些方面非常有趣,因为它们继承并改造了古典的诗歌形式。我想我阅读了所有能够在北美的书店或者图书馆里能够找到的中国诗歌。这种阅读开始在我本人的诗歌写作中开花结果。我的第一本诗集于1987年在多伦多发表,诗集的名字就叫《长征》。千真万确,我是从雷蒙德·威廉斯那里,而不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得这个意念的。他们两人都遵循一种非常古老悠久的哲学和诗歌传统,古老的中国崇尚“道”,而罗马人遵循“生活之路”(iter vitae)。

我诗集的标题表明了我对于中国传统的感激之情,诗作更明确地提到了《诗经》,提到了诗人杜甫、李白、寒山、白居易、竹林七贤、陆游、苏东坡等。在我后来的作品中,我又增加了李清照、陶渊明、徐渭、王维、等等。我感觉到,在中国诗歌和文化面前,我就像一个在大海岸边嬉戏弄水的小孩子,不过是扔出了一些小石子,让它们轻轻地跳进那大海的波涛。

我还阅读并搜集了从鲁迅以来的重要的中国现代小说,

以及古典小说《水浒传》《红楼梦》,它们都是通过英语翻译过来的。所以,上世纪80年代,当我在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讲授比较文学项目的博士研究生课程时,我决定讲授散文,并且在那份从薄伽丘到托尔斯泰的名单里加入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虽然它在篇幅上稍逊于《红楼梦》,但在我心中它与后者一样有趣。接下来我写了一篇文章,递交给1985年在香港召开的“文学与人类学”研讨会,1986年被收入《文学与人类学》这本书。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叙述媒介分析:类型与中国古典小说》,文章在结尾部分分析了《儒林外史》的叙述媒介。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在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地区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将它翻译成中文。也许是我没有遇到恰当的人,或许是因为它太标新立异了。因此,尽管我的著作被大量地翻译成日语和主要的欧洲语言,到现在这两部著作才是我首次呈现给中国读者的文字。

麦吉尔大学的研究生比较文学项目进行得非常火红,以至于被其他语言院系嫉妒。最后,大学一个厉行节俭的管理小组以其过于激进为由而终止了。而且,一个不懂汉语的学者很难能够在人中国待上较长的时间,这也意味着我对于中国的兴趣无法深入下去。当然,除此之外,通过我的诗歌阅读和诗歌写作,我仍然或多或少地与伟大的、无法超越的中国诗歌传统保持着紧密的呼应。这个传统也许只有整个欧洲的传统才能与之比肩。由于我自己深深地浸染在欧洲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的文字作品更具有激发新奇灵感的优势。与甚至影响了最杰出的欧洲世俗思想的神教教义相比,我更多是通过阅读佛教和道教(这是我喜爱的宇宙哲学)获得灵感。

现在,我将自己从1993年以来创作的一些诗歌——尽管并非是我最好的诗歌——作为本文的结束部分。这些诗歌是我在阅读了大量的中国诗歌之后,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8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刻写出来的。这场革命的命运,无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决定性地影响了在欧洲和亚洲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只不过我个人也许更能比许多其他人意识到它的影响,更受惠于它的影响。因为我还在孩提时代就已经目睹了南斯拉夫的革命,并且被它所拯救。我认为,这种心情可以被

■记忆

## 父亲舒群在「鲁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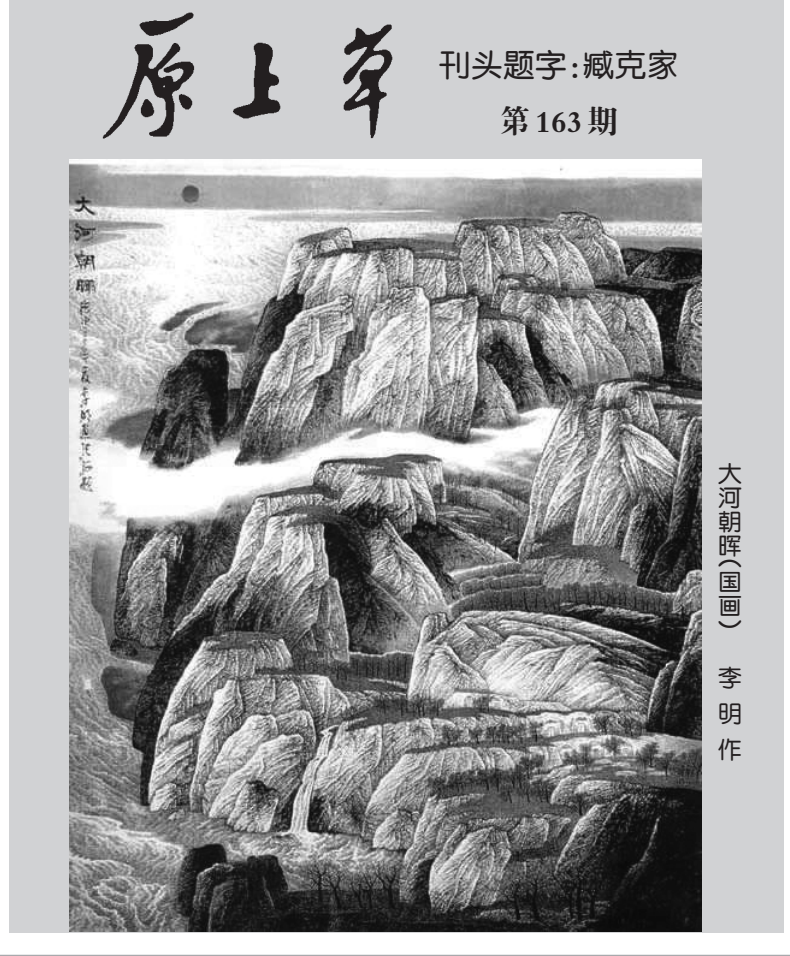
□李霄明

父亲年长我近50岁,他生前很少与家人、亲属谈他的过去。高铁先生在他去世后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他的光荣历史,也没有说过他的辉煌业绩,更没有抱怨诉苦……”这就是父亲的性格,一生不变的性格。

2011年,我有幸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习,这是我第一次到延安。过去因为父亲在延安工作过,所以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一个情结,就是到他在延安工作过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父亲和前辈们走过的印迹,以及他们留下的传统。他晚年的时候跟我讲过,一生中,在延安度过的那段艰苦岁月,是他最留恋和怀念的。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一生的信念源泉和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1938年到1945年,父亲两进两出延安,主要的工作单位是《解放日报》和“鲁迅艺术学院”。记得父亲晚年片言只语谈到的一些在“鲁艺”工作期间经历的事情,那时他身肩“鲁艺”文学系教员、系主任,同时又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后改副刊)主编,工作繁杂,责任又重。两个单位之间相距较远,每天往返于两地之间,甚至一日数趟,那段20余华里的路,天晴时尘土飞扬,下雨时满脚泥汤,一天下来精疲力竭,两个单位的工作性质不同,但都很重要。《解放日报》文艺栏这边日常工作由博古领导,重要稿件需父亲呈送毛主席审定。父亲上任时正赶上报纸改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把“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每月要编几十万字的副刊,而另一方面,在“鲁艺”要进行每天日常的教学、研究制定教学计划、印刷学习材料及大量的日常性工作。父亲说,那时很苦、很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但内心是愉悦的、充实的,思想是淳朴简单的。那时的父亲,工作中充满激情,在文学系教学工作中,他善于团结同志,发挥他人所长,积极主动与系里的教员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等人共同商量教学内容、制定教学方案、积极扩大教师队伍。在他的努力下,又陆续调来了艾芜、萧军等人。在他任系主任的那段时间,文学系培养了大批我党的文艺骨干。新中国成立后,“鲁艺”文学系出来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新闻界、文艺界的领导和名作家、名记者。

1942年,延安整风,父亲在“抢救”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主要疑点是1934年他在青岛被捕入狱的那段时间的表现。在被停止工作接受审查的两年里,前一年他被严密看管。听他说,当时险些殒命。1943年春,王震旅长出于同情和友情,怕父亲发生意外,为他担保,让他到三五九旅开荒种地,由三五九旅代为看管,此时父亲才得以脱离险境,安心地等待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春播之后的几日里,父亲注意到部队一些战士每天晚饭之后,就集中起来剃光头。一个多月中,反复多次。一天晚饭,他又看到了几十个身体强壮的战士在剃头,他不解地问王震旅长这是怎么回事。王震旅长笑眯眯又很神秘地说,他们晚上出去“砍萝卜”。父亲还是听不懂,王震旅长这时表情严肃地说,这是军事秘密,但可以告诉你。他说,这是去夜袭阎锡山的部队。没有特殊情况,不许开枪,只能用大片刀,摸着有头发的就砍……这就是“砍萝卜”。父亲晚年有时讲到类似这样的事情时,也都显得很神秘、很得意。有时还会露出会心的一笑。在三五九旅近一年的时间中,父亲与王震旅长朝夕相处,叙家常,吃小灶……父亲多次说道,王震同志是一位有血性、会打仗、重情意的好兄长。

1944年秋收之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澄清,有了结论,恢复了工作,又回到了“鲁艺”。“八一五”光复后,中央委派父亲任团长,组建由“鲁艺”知名工作者参加的“东北文化工作团”,远赴东北接收“满影”、“东北大学”、“新大陆科学院”等文化单位。在这个近50人的团队中,有沙蒙、田方、公木、华君武、刘炽、严文井、雷加、王大化、王家乙、于兰等。至此父亲告别了他生活、工作、战斗了8年的延安。父亲自延安整风运动后,又经历了“反右”、“文革”,长期深陷政治旋涡,但他始终坚守信念,不改初衷。自1945年父亲离开延安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大河朝晖(国画) 李明作

## 山(外三首)

□董恒波

山和山挑起臂膀,  
才有这样的力量——  
每天早晨  
都扛起一颗新的太阳。

### 小路说

没有那  
上山砍柴的孩子,  
就没有我。

没有那  
上山拾蘑菇的孩子,  
就没有我。

孩子们的脚印  
就是我  
身上的花朵。  
  
我举着鲜艳的花朵  
把孩子们送进  
大自然的王国。

### 果园故事

送走了雨,  
又迎来了风。  
梨儿绿绿,  
苹果青青。  
可总是一个颜色,  
它们有点不高兴了。

太阳说:  
别急,别急,  
给你抹点黄,  
给你擦点红,  
就变成了漂亮的好儿童!

### 瀑布

我是一条  
站  
起  
来  
的  
小  
河  
是大山把我扶起来的。  
我不能总躺着,  
躺在地上,  
怎能看清我美丽的祖国。

■艺文空间

## 李明册页

□郑彦英

浩大的视觉冲击力。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线条,有一条飘带,自上而下,一气呵成,流畅精美。在书画家们感慨唏嘘的时候,年轻的李明情不自禁,扑通一声,朝着画跪下了,而且五体投地,虔诚地磕头。

很多书画界同仁都在讲师法古人,李明的师法在骨子里,古人的灵性已经体现在他笔下的高山流水、茂林修竹中,古人的情采已经浸洒在他的笔墨色彩里,他在用绘画与古人对话,于是就到了更高一个层面,从他的山石草木、小桥流水中,可以看到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所以,面对古人原作,他的崇敬之情自然不可遏制。

岁月荏苒,我已经在郑州供职数年,但李明拜画的镜头依然历历在目。这期间,李明获得了许多大奖,应邀赴俄罗斯、日本、法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和进行学术交流,河南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办公大楼里,郑州火车站、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北京京西宾馆、北京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馆,都有李明创作的大型布置画。同时,李明的多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文联、毛主席纪念馆、北京大学、中央电视台、解放军画报社等单位收藏。在我办公的省文联三楼迎门大厅,就布置着李明的山水画《禅隐云山图》,这幅503×193厘米的作品,山以绿为主色,树以青为基调,于是,山有了生机,树有了华茂,云彩和水流,似乎兴味盎然地游走于山林,虽然笔墨中多处溢散着宋人古风,但却少了宋人禅画中的重要原则——色不压墨。李明可能会这样想,既然世间万物皆具佛性,青山绿水间自然就蕴涵着禅意。

从郑州火车站的《大河朝晖》,到省文联三楼大厅的《禅隐云山图》,人走了多年,画上了数级,从笔墨走到生命,从生命走到灵魂。前天与几位友人做新年聚,李明送我一本山水台历,封面题目为《李明·2012·山水画》,下面有一句话让我怦然心动:

我们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为了你的到来。

你是谁呢?你是我,是他,是所有欣赏或者浏览、翻阅他的画的人。

再看李明,比起我在三门峡见到的李明,脸上的红润少了,浓密的头发稀了,那些红润,那些英气,那些黑发,是生命,是青春,是时间,它们到哪里去了呢?

它们到了李明的画里,他们到了我们的眼睛里,它们微笑着在我们心里。

解读为一种“忧患意识”,一个迷惑不解但又对这个国家心怀良好愿望的局外人对于中国的担忧。当然,这同时又是一个诗人对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世界担忧的一种移位替换的表述,一种“心忧天下”的扩展的表述。

我希望这两部著作的勇敢的翻译者能够将它们的英语原文印行出来,再对应于中文的散文翻译。对于一个中文诗歌形式的译文,只有一个注意到它的押韵对句等因素的专家,才能够体会它们的意义。(作者原信中附诗作7首,本报仅选其《读王维诗有感》6首中的一首)

### 花开花落细无声<sup>®</sup>

树梢木槿花,怒放红花萼。  
山中寂无人,花期无绿织。  
小溪蜿蜒流,悄然入深林。  
花开又花落,来去细无声。

(1997年11月)

在我的诗集《长征》的跋中,我这样写道:

本诗集中的许多诗,当然并非所有的诗,都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下,或者在与它们进行有意识的对话中写出来的,我把中国古典诗歌主要当作针对作者所处社会的某种特定情感结构而采取相应态度的一种指南。中国诗歌就我的阅读所知,并不把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把公众视野与个人视野区分开来,把情感与理智区分开来,把“我”与“我们”区分开来。本诗集中的这些诗歌力图做到整合如一,当然,在许多方面,断然无法与很多中国古典诗人的整体性和完美性相提并论,但可能有相似之处。因此,这些诗歌追求的目标就是像中国诗歌一样,巧妙地距离感和认同性这两极之间自如运动。

让我向我的中国读者披露一个秘密吧:上面的努力尝试,都体现在我整个著述的立场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发现自己对于中国文化有如此强烈的喜爱。

那么这一切又与科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它们是以模糊的、隐约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我的生活和批评生涯中,我的中心态度就是“现实未必只能如此”。我置身于宏大的欧洲传统(虽然我承认还只是一小部分)之中,这些传统从民间故事或蒙田开始,总是将“他者”作为一面镜子,来映照我们的缺憾和可能实施的改进。所有重要的科幻小说都是这样的。而欧洲心目中的“他者”从传统上始终是中国,而且现在这种倾向有增无减。

我亲爱的中国读者啊,我向你们表达我的问候和最热情的祝愿!我只希望你们能够发现,那些学术研究的散文,虽然多少受到禁锢的行文版式,但还保留着某些我对于两种诗歌传统的痴迷追求,它们是在与“他者”进行交流对话。一个答案也许就在于,这种新的思想概念,就是散文的诗化。因此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够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幸运地发现“采矿于山,点化成金”是可以实现的。

①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英国文化唯物主义的代理论家之一,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创建了文化唯物主义理论。

②王维原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舒伟译)